

· 著名学者与藏书 ·

顾颉刚藏书记（下）

顾 洪

（二）

余嘉锡先生藏书极多，“但只有明清刻本，而没有宋元珍本。因为他是为读书而买书，……所藏的书凡是四部有用的书和丛书大都具备，与藏书家收藏古本不同。……他是目录学家，善于辨别版本的优劣。所藏的书，虽然普通，却是精选的刻本”（周祖谟、余淑宜文）。顾颉刚先生的藏书大体和余先生一样，但又有自己的特点。下面分二部分论述。

1. 珍善本书

三代人积累而成，是文库一大特点，虽屡遭破坏，仍留下不少珍贵古籍。

其祖父喜治小学，故存有不少有关《说文》的书。如明末胡氏石竹斋刻本《说文字原》、清同治中碧螺山馆补刻《段氏说文注订》附《说文新附考》，都是较好的本子。光绪元年手抄诸可宝撰《说文部首音读本附切字刍言》，并有此年腊月作者手校，先生幼时在封面上题：“先祖廉君公手抄诸迟菊先生《说文部首音读本切字刍言》，孙诵坤谨署”。廉君公游鄂时，曾与诸可宝（迟菊）、柯逢时（逊庵）商榷许学，搜辑逸字一百余文，其中有以新附字及

《字林》为《说文》者，因而对此疑信参半。光绪十二年手抄郑珍《说文逸字》，并辑《偏旁逸》，谓：“去冬幕游来黔，见同事李伯昆兄案头有友人所赠《说文逸字》一书，翻阅一过，知其搜罗甚广，证据甚精，不谓郑君竟先得我心者。其附录三百余字，尤为卓识，本非许君旧文，而为前人误偶《说文》，此所以于逸字外严为剖别也，后之人并不得议其疏漏，其有功于许书岂浅鲜哉。嗣因遍购是书不得，遂假书抄录，惟将偏旁逸字三十七文另编一类，名之曰《说文偏旁逸》，使阅者知许书已有其文，郑君所谓有子无母者是也。”此书的珍贵由是可见。虽已受潮，仍很清晰，并可确定为抗战后从北京运回上海者。

其父子虬公喜文学，集部善本多为其搜集。其中有：明万历新安汪氏刻《蔡中郎集》，清初吴郡宝翰楼刻《徐孝穆全集》，钤有陆陇其“三鱼堂”印的明嘉靖本《杨炯集》、《骆宾王集》、《陈伯玉集》，钤有张金吾“爱日精庐藏书”印的明刻本《六臣注文选》（残，存二卷，亦经秀野草堂顾氏收藏），清康熙吴孟举刻《瀛奎律髓》，清康熙王士禛辑刻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，普定姚大荣所藏、康熙林佶写刻本《尧峰文钞》，康熙昆山徐氏刻《李义山文集》，康熙新会何氏刻《白沙子全集》，康熙宋荦辑刻《江左十五子诗选》，康熙娄东施天骥木活字本《吴都文粹》，康熙刻《吴风》等。

这里应特别提到子虬公苦心搜求的家刻本、抄藏本。从1928至1932年，陆续蒐得八世从祖侠君公顾嗣立（先生的九世从祖）辑录及续注的、康熙秀野草堂刻本《诗林韶濩》、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，迁客公顾嗣协康熙依园刻本《石湖居士诗集》，顾嗣立辑、康熙秀野草堂刻本《元诗选》初二三集，顾嗣协辑、康熙新会绿屏书屋刻本《冈州遗稿》，顾予咸（嗣协嗣立之父）顺治山阴刻本、温庭筠之《八叉集》（子虬公称此本为“吾家版刻之嚆矢”），顾嗣立删补并刻《昌黎先生诗集注》，顾嗣立撰、康熙秀野草堂刻本

《间邱诗集》、《桂林集》，顾嗣协撰、康熙秀野草堂刻本《依园诗集》、《楞伽山人诗集》，1930年陈垣励耘书屋抄本《顾迂客玉台新刻诗》。秀野公（即侠君）藏本有康熙嘉定陆氏刻本《三易集》、康熙吴郡朱氏刻本《乐圃先生余稿》、文徵明六世孙刻本《莆田集》。道光中顾元凯（先生的五世从祖）在浔州郡署刻了一大批族人著述，子虬公陆续收集到的有：《秀野草堂诗集》、《寒厅诗话》（嗣立撰）、《秀野草堂合编》（予咸撰、嗣立嗣协附）、《玉台新刻》、《古冈初政录》（嗣协辑撰）、《秀野公自订年谱》、《涤斋公自订年谱》、《通奉公年谱》、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、《澜溪赠咏》、《闲余吟稿》（廉君公之祖顾瑛撰）等，在搜集过程中得到顾颉刚、顾廷龙、陈乃乾、陈垣等人的热心帮助。

金石书籍亦大部为其所藏，其中不少佳品，如四个版本的《宣和博古图录》，其中元刻明印本残存2册49页、明嘉靖刻本残存4册89页，为版本学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；明万历刻本为全帙；清刻本不分卷，有手摹篆文，书根题为“吴大澂手摹”。刻本较精者还有乾隆本《重定金石契》，《石刻铺叙》等。抄本中，不分卷的《天下金石志》，书口下题：“虞山周氏鸽峰草堂钞藏”，并钤有“鸽峰草堂”印，为民国元年常熟周大辅精钞。

颉刚先生自己也得到不少珍善本图书。

1926年11月，胡适在伦敦书铺中买到一册明代高丽刻本《五伦行实图》第三卷，用中朝两种文字记载了从春秋至明代的“烈女”，并配有图画。书用桑皮纸印，目录页下方钤印被剝。书皮的右上角写着“内赐”，书名下写着“利”字。由此推断，可能为内府本，按“元亨利贞”的顺序，当为四卷四册。书前有胡适1930年6月3日题识，写道：“因为中有殖妻哭夫故事，也许於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有点用处，故买了回来，送给他。”

前面提到孤本《桐桥倚棹录》，在“苏州五老”之一王伯祥之子湜华的热心串联下，1975年前后由叶圣陶题写篆字书名：“顾藏

桐桥倚棹录”；俞平伯题写绝句十八首，并为函套题签；谢国桢、夏承焘、吴世昌、陈中辅等当时学界耆旧纷纷题识，或辨析版本源流，或考证书中记载的民俗，直可为学林佳话。

上面说到 1954 年在曹元弼家挑书，颉刚先生的所得可谓“捡剩”，然而仍有佳本。如：戴震校订不分卷《水经注》，虽乾隆刻本而传世极鲜，原为汪闳源旧藏，后归王大纶及曹元弼，“最后归于余，不可不宝也”（该书题记）。又《六书音韵表》五卷，为乾隆时段玉裁自刻于富顺官廨，是陈奂过录戴震点本。又乾隆曲阜孔氏刻《尔雅》三卷，是陈奂过录段玉裁校订本。

文库现存两部嘉庆刻本《通艺录》。一部钤有“希□韩氏家藏”、“桐城柏堂方氏家藏”印；后一部先生 1951 年秋题识道：“此本先父所购也。书贾以其不全，挖去目录卷数，复装订失其次第，如《周髀用矩述》一文也，而分置二册，为原刊绝少见，一时不易知其所阙若干。闻《安徽丛书》已将此录重印，当访求之。”据《贩书偶记》可知嘉庆八年刊本为此书初印本，又由《安徽丛书》第二期影印本知，初刻初印本页末有“惟初太始，道立於乙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”16 字（《贩书偶记》只记后 8 字）；原刻包括正目（19 篇）、附录（2 篇）、未成书三部分，皆不分卷。文库所存两部亦不分卷，后一部存 13 篇，并有 31 页标有“万”字，而《安徽丛书》所用底本没有“万”字页，可见后一部确为初刻初印本。

另外，刻本中的明末刻不分卷本《九边考》，康熙五十四年辽海刘氏刻四卷本《在园杂志》，嘉庆二年刻不分卷本《经义述闻》（先生题识：“王引之刻此书时，均逐篇分刻，不相衔接。及全书刊讫，乃依经文次第，排比而联接之。今所见者均重刊本也。此初刻本极鲜见，……至可宝贵。”），曾经元和栩缘老人王同愈（胜之）收藏的御儿吕氏宝诰堂据白鹿洞原本重刻的《仪礼经传通解》23 卷、《续》29 卷、《集传集注》14 卷；抄本中据二老阁进呈

明刻本影钞之《绛守居园池记》1卷，清抄本《书经集解》6卷（卷一下题：“义门何手录”，并钤有“义门”章一方），以及前面提到的钤有“王氏信芳阁藏书印”的清抄本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两《疏证》；拓本中民国何遂（叙父）所辑《瓦当存腋》等，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善本。

2. 可供研究之书

先生在1965年立的遗嘱中写道：“我的藏书，虽无值大钱的古本，却有许多名著的原刻本，许多书现在已买不到。又有一种书而搜罗了许多版本，足供校勘之需。”且不说随着时代的变迁，“不值大钱的古本”有了变化；且不说许多名著有了排印本，不难买到；值得一提的是一种书的许多版本和研究某一方面的许多专著，不但可供校勘之需，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省去了不少搜寻的麻烦。上一部分所述并非不可供研究之用，只是此处记述的不但有善本，而更多的是普通版本、并与先生的学问关系更密切的书。

像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水经注》等书，是他一生研究工作所必备的。从书目里可见它们的各种版本以及相关专著收集得很齐备。如明梅鷟撰、清汪景龙抄本《尚书谱》，1950年冬由上海孙鉴家散出，他从修文堂得到，疑明代即无刻本，而传抄又稀，殆为海内孤本；清人戴钧衡的《书传补商》，因太平天国事起，社会动荡，故流传不广（均见该书题记）。清人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为民国十三年钱玄同代购，是民国初年云南丛书处刻本，他指出其好处为：“在能以后世之诗词歌谣与三百篇相比较，故颇能见其真意义。”（该书题识）桐城张承华撰、同治本《三颂备说》，各家书目中少有著录，但因其有历史眼光，研究方法有突破，故收集之。有关三家诗的著作也很多。对于《春秋》三传的题识批语多达十数部，足见其对《左传》的重视。他“宿志将《水经注》手写一过，分析经文、注文及校正讹字，评其错失”，“为全、赵、戴、杨之总结工作”（见乾隆新安黄晟刻《水经注》题识），因

此各种版本搜罗较全。

文库存有先生精读之书，如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（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）、《庄子》（民国九年浙江图书馆翻刻本）、《吕氏春秋》（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刻本）、《淮南子》（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本）等，都有许多眉批评点，虽然版本普通，但值得后人作深入的研究。他服膺章学诚的学问，收集有多种版本的《章氏遗书》。他还在《汉魏遗书钞》所收的张霸《百两篇》、《广仓学君丛书》所收的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、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》所收的《朝鲜史略》等书上，留下重要批语。

讖纬书的搜集，在“鼎盛期”已有介绍。其中天一阁故物，即1930年在北平得到的明代青丝栏抄本《礼纬含文嘉》，为《读书敏求记》所著录，十分珍贵，战后复得之于东方图书馆，“以所置之柜有颉刚藏书字，犹得璧返”（刻书题识）。他在嘉庆秀水章氏勤业堂刻本《考正古微书》上题道：“予尝欲综明清两代所辑纬书为《讖纬集录》一书，着意求之，因得此本及殷元正《集纬》写本等。方将编写而日寇侵华，北京不可复居，弃藏书而西行，此志不获实现。乱定归来，所藏已残损，而章殷两家书尚存，喜而题之，不知此生尚能从事否也？”此本在各家目录书中较少著录，亦是珍本。其他现存文库的纬书，如嘉庆本《古微书》、赵氏《七纬》、光绪本乔氏《纬攷》、勤业堂《易纬八种》等，都应是战后重购。

由于早年熟悉目录学，又编《清代著述考》，了解清代各种学派及师承关系，故对于清人的集子十分留意。认为学术记载除正史通鉴外，尚需旁求于各家文集笔记中。谓：“予既治考据之学，对于经史诸家之文集笔记，每有所见，不忍不购，虽囊橐空乏，犹不得之不安也。”（黄承吉《梦陔堂文集》题识）因此文库藏有各代文集，尤以清代为多，其中亦多佳品，这里略举一二。如杨椿《孟邻堂文集》，谓其人“于经史并有研究，而不自附于古代家派，此则清初学风使然”（民国影印本，该书题识）。又李遇孙之祖李

集的《愿学斋文钞》，“此集颇罕，观王重民君编《清代文集篇目索引》亦未及知，北京图书馆未有也”（嘉庆本，该书题识）。又萧穆《敬孚类稿》，“此书好处，在能将社会情形照直写出，不加掩饰，颇能见社会真状”（光绪本，该书题识）。又顾家相《勳堂文集日记类钞》，谓其“承清代考据之学，甚有识别裁断之力”（民国排印本，该书题识）。又裘可桴《可桴文存》，“此人虽于学问钻研不深，而颇能提出问题，亦二十世纪初叶之有心人也”（民国无锡排印本，该书题识）。又许巽行《文选笔记》，谓此人“一生研究《文选》，至于十校，成《校正文选》六十卷，《文选笔记》八卷，及身未付剞劂。……解放后，予移居北京，得此于中国书店，而在江浙则未曾见之，流传至少可知矣”（光绪刻本，该书题识）。

1962年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特点为：“由目录而入史学，所有裨于史者，聚各种资料而比较之耳。至于声音、文字之微，则未曾入门。”（《读书笔记》第八卷，p. 6103）他的藏书自然也带有这个特点，能够打破“正统派的气息”（参见《年谱》，p. 165），广为收集有史料价值的图书。如明代林时对的《荷锺丛谈》，即1927年夏在杭州书肆所购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世间绝少刊本，因刊入《史料丛刊》中（见该书马太玄后记）。一册抄本《听讲随录》，应为50、60年代得于旧书肆。他在封面题道：“此为清季贵胄学堂学生之听讲笔记，而书签有‘顺承王’一印。考《清史稿·皇子世表二》，太祖第二子代善为礼亲王，代善第三子萨哈璘追封颖亲王，萨哈璘第二子勒克德浑，顺治五年以功封顺承郡王，九传至讷勒赫，光绪七年袭封，记此者殆为讷勒赫之子乎？”虽然将一大批近代史料捐给合众图书馆，但文库中还存有一些，如清末抄本《苏藩政要》、清末民初排印本《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》以及抗战时后方用土纸所印《四川工商社会苛捐杂税概录》、《四川农村崩溃实录》、《彝族调查报告》等，其中还有一些战前禹

贡学会的藏书。先生爱旅游，故收藏了很多游记，从中可知各地风土人情、地理经济、文化、方言等等。民俗方面有《吴歆百绝》、《吴风》、《挂枝儿》、《集杭谚诗》等。《吴歆百绝》题识谓：“此书为苏雅卿重刻于同治十一年者，……以其下开顾禄之《清嘉录》，记苏州旧时风俗醺醺有味，故检付湜华同志复写一本。”（该书题识）

先生治历史地理学，又以故里在江苏，多年来收集到不少江苏省府州县志书，仅乡镇志书就有《同里》、《光福》、《周庄》、《黄埭》、《相城》、《平望》、《法华》、《梅里》、《黎里》等十数种之多。

文库中还存有清末民初翻译、介绍西学的书籍，包括他用过的课本和幼时的读物。其中最早的藏书包括钤有“苏学分会”之印的《泰西新史揽要》（光绪刻本）。戊戌变法前后，江苏成立了“苏学会”，苏州即有分会，子虬公是分会会员（见《年谱》，p. 8），可能此书为学会解散时分得。同类还有《万国史记》、《列国变通兴盛记》、《泰西名家传略》等，并有子虬公的批评之语。另外，法国人的《哲学论纲》，日本人的《哲学要领》、《理学钩玄》、《穆勒名学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，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，以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《西学书目表》、《西学书录》、《西学辑存》、《西学大成》、《西学启蒙》等，这些光绪末年出版的书，其内容现已无大用处，但作为研究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历史，还有价值，并且已不大好找寻了。

引文使用简称者，说明如下：

1. 《年谱》：顾潮编著《顾颉刚年谱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3。
2. 《笔记》：顾洪编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，1990。
3. 顾廷龙文：《介绍顾颉刚先生撰〈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〉——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》，《文献》第8辑，1981，6。

4. 《〈书巢〉后记》：《王伯祥先生〈书巢图卷〉后记》，同上。
5. 《丛书子目类编序》：《东方杂志》第39卷第5号，1943，5，15。
6. 《仪礼通论》“点校说明”：陈祖武撰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，10。
7. 《呈教育部信》：呈为个人所藏图书文物扫数被敌人劫掠请求追偿事，1945，12。
8. 方诗铭文：《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先生在苏州的二三事》，《苏州史志资料选辑》第二辑，1984，9。
9. 顾永新文：《薪尽火传 力肩斯道——访王煦华先生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1998，3。
10. 江澄波文：《顾颉刚先生访书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89，5，1，副刊。
11. 《印选》：纪宏章编《罗福颐印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6。
12. 周祖谟、余淑宜文：《余嘉锡先生学行忆往》，《中国文化》1996，春季号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